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一、研究对象

朱德熙（1982）根据述语和补语组合紧密程度的不同而把述补结构分为黏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黏合式述补结构又分为由结果补语组成的述补结构和由趋向补语组成的述补结构两类。本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狭义的动结式，即由结果补语组成的黏合式述补结构。

二、选题缘由

动结式作为汉语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谓词性结构，从王力（1943）提出“弄坏”这一类“使成式”之后，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早期的动结式研究主要关注动结式的定义、分类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动结式的论元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句式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描写了各种动结式的论元数目、句法分布，而且试图对它进行形式上、认知上的解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对于动结式及物性的研究大多是从配价的角度来考察它们带宾语的情况，也有学者从认知、韵律等方面对它进行了研究。而实际上，动结式的及物性不仅仅是它能否带宾语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句子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细论述。

现代汉语关于动结式带宾语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而汉语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以往汉语史关于动结式的研究都是讨论它产生的时间、判断标准以及来源和发展等问题，而很少有专门研究动结式及物性问题的，我们只看到少量的文献中涉及了动结式带宾语情况的研究，如刘子瑜（2008）。所以，我们认为，对



2

宋代动结式的及物性研究

动结式的及物性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再者，动结式不同于一般的动词，它能否带宾语不是单纯由述语或是补语决定的。这里就涉及述语和补语的论元中哪一个会优先实现的问题，而且宾语以工具格、旁格或是别的什么形式实现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汉语史关于动结式及物情况的研究中，都很少有学者涉及。

之所以将时代选择为宋代，是充分考虑到了动结式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关于动结式的产生时代，有下面几种说法：1. “先秦”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周迟明（1957）；2. “汉代”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祝敏彻（1963）、程湘清（1984）、柳士镇（1992）、宋绍年（1994）；3. “六朝”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志村良治（1995）、李平（1984）、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4. “唐代”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太田辰夫（1958）；5. 不同类型的使成连动结构向动结式语法化的时间并不相同，而这种语法化的不同是由述语和补语的及物性决定的。洪波（2003）认为“上古的使成结构向动结式的语法化首先是从及物动词加及物动词的视觉动词加知觉动词这一小类开始的，而此类由其他动词构成时，其语法化是从汉代开始的；及物动词加使动词构成的使成结构和不及物动词加使动词构成的使成结构随着使动形态的消亡而消亡，分别并入及物动词加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加不及物动词两小类；及物动词加不及物动词的使成结构从东汉后期开始向动结式演化，最终完成的时间则要到元代；不及物动词加不及物动词构成的使成结构从战国后期就开始向动结式演化，到汉代，其语法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而无论是这五种说法的哪一种，到了宋代，动结式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宋代的动结式数量比较多，和现代汉语相比，种类也基本上发展完备了。而且，在宋代，动结式出现的句法环境也越来越成熟，我们找到了很多用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例子。

第二节 动结式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共时平面的研究

动结式及物性问题的研究在汉语史中比较少，而在现代汉语中则是成果丰硕。下面，我们就现代汉语中关于动结式及物性的研究情况进行一些简单的评述，以期从这些成果中探求到一些适用于汉语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现代汉语动结式及物性的研究又是建立在对动结式的性质、语义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也一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一) 关于动结式的性质、语义等基本问题的讨论

1. 动结式究竟是词还是短语的问题，语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如果将动结式看成是一个复合词，那么它就应该和动词有结构上的平行性，我们也可以将其分为非宾格、非作格、宾格、使役等。很多海外的学者尤其是研究生成语法的学者倾向于将它看作是复合词 (Li, 1990; Cheng & Huang, 1994 等)，日本学者太田辰夫 (1958/1987) 也将“打倒”“写好”等看作是复合动词。国内很多学者也将动结式看作是一个词汇结构，赵元任 (1979) 将黏合紧密的述补结构称为“复合词”，顾阳 (2001) 认为汉语中的“V – V动补复合词”是一种非常多产的动词。梁银峰 (2006) 认为述补结构内部分为不同的层次，他将能带宾语的双音动补结构看作是词，而不带宾语的看作是短语。董秀芳 (2007) 从词汇化的角度研究黏合式动补结构的性质，她认为汉语史上动补结构的形成不是一种句法结构的变化，而是一种词法的变化。

而将其看作是短语的学者也很多，如朱德熙 (1982)、宋文辉 (2004b) 等。

我们如果将动结式看成是词的话，那么补语的性质是什么？是词缀吗？显然，只有少数补语我们可以看作是词缀，例如刘丹青 (1994) 提出的比较虚化的“唯补词”。再者，如果将动结式看作与一个简单的动词相当，那么就将很多问题简单化

了。例如：“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中的“哭倒”，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将它看作是一个及物动词的话，那么应该如何去分析它“使成”意义的来源？因为，事实上，“哭”和“长城”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论元联系。

我们比较赞同施春宏（2008a）的观点，将动结式看作是介于词与词组之间的成分。动结式表示一个致使事件（causative event），它由使因事件（causing event）和使果事件（caused event）两个子事件组成。而使因事件的主体成分是致使关系中的发出者，使果事件的主体成分是致使关系中的变化者（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我们认为，对它的研究既要注重从论元整合的还原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又要注重整体性的把握。

2. 关于动结式核心的研究

动结式核心的确定在以往的研究中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讨论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时候涉及哪个成分的论元优先实现的问题。Li (1993) 认为动结式是一个复合词，而其词法核心是核心动词，他认为“核心的某些关键信息一定在复合词中保留”。

目前关于动结式核心的说法有以下几种：①动词是核心的说法，并且倾向于将语义核心和句法核心相分离，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袁毓林，2000；沈家煊，2003；宋文辉，2004b 等）；②结果补语是核心的说法（李临定，1984；马希文，1987）；③核心不确定说，如任鹰（2001）认为动结式的核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结果补语；④功能范畴说，代表学者是熊仲儒、刘丽萍（2005）。

关于①②③这三种观点的述评，我们赞同沈家煊（2003）、宋文辉（2004）的研究，认为确定动结式的句法核心主要在于它的形式特征。而④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往往会导致动结式根据它所处句式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句法核心的情况，其实这种观点与“核心不确定说”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一个理论的解释如果过于宽泛，我们就不能对它进行证伪，那它存在的价值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同意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动结式的语义核心是补语，而句法核心是动词。这样的区分似乎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动结式的语义特征以及它在论元结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例如：如果结果补语语义指向是动词，那么动结式能否带宾语就取决于述语动词的及物性。

3. 关于动结式语义的研究

关于动结式语义的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①动结式究竟表达什么样的语义；②动结式中补语的语义指向问题；③关于歧义动结式的研究。下面，我们简要地对它进行一下评述：

①动结式究竟表达什么样的语义，很多学者都有过相关的论述和分类，如陆俭明（1990），崔承一（1991），黄锦章（1993），王红旗（1996），马真、陆俭明（1997），张旺熹（1999），施春宏（2008a）等。

这些研究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在动结式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将补语笼统地看成是一个同质的类，而应该从语义上对它进行再分类，因为不同的类往往会影响它的论元实现情况。陆俭明（1990）指出表示结果偏离的“VA 了”结构后面不能带宾语，这和表示结果实现的“VA 了”结构不同。

②动结式补语的语义指向问题，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它进行过研究的学者有：李子云（1990），梅立崇（1994），卢英顺（1995），马真、陆俭明（1997），宋文辉（2004a、2007），姜红（2007）等。

李子云（1990）和梅立崇（1994）认为主宾同现的动结式句子中制约补语表述对象的因素很多，既有句法的，也有语义的，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写。

研究动结式配价的学者们尤其关注补语的语义指向问题，因为补语的语义指向往往决定着动结式论元的实现情况。袁毓林（2001）、施春宏（2008a）就区分了“同指结构”和“异指结构”，并以此作为动结式配价研究的基点。宋文辉（2004a）指出以往归为补语指向动词的动结式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类，其补语的语义指向往往不是单一的，这是影响它配价的决定因素。卢英顺（1995）也指出“我吃完了饭”里面的“完”既指向动词“吃”，也指向受事“饭”。